

丝路豹斑

——不起眼的交流，
不经意的发现

冉万里 著



科学出版社

丝路豹斑

——不起眼的交流，不经意的发现

冉万里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共分九章,分别为:瓶花盛开——德瓶纹饰的源流;象以齿焚——象牙与象的输入与使用,犀以角亡——犀牛与犀角的输入;龟甲延寿——龟甲纹反映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毳路飞鸿——毳路纹反映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童子、花绳与龙马;相映生辉——东西方之间工艺与造型的影响;花马世界;吐鲁番北朝至唐代的太阳与月亮图像——中原与西域文化的交汇点等。九章内容以“丝绸之路”为线索,将其串联在一起,从而构成了本书的架构。全书所述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前辈学者已经在有关论著中有所涉及,但无暇展开论述者,著者在其基础上结合新的考古发现进行了全面综合的研究;二是国外学者以日本学者为主,对其本国所涉及的问题已经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著者在其论著中的观点启发之下,对我国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三是著者在读书学习、教学和研究过程中的一点心得体会,属于不起眼的研究成果,或者说是还不甚成熟的感想。综合而言,本书内容丰富,观点新颖,图文并茂,附有插图八百余幅,适合考古工作者、美术史研究者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路豹斑:不起眼的交流,不经意的发现/冉万里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03-047721-7

I. ①丝… II. ①冉… III. ①丝绸之路—研究 IV. ①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0602 号

责任编辑:孙 莉/责任校对:钟 洋

责任印制:肖 兴/封面设计:张 放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1 1/2

字数:510 000

定价:1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出版得到

西北大学“211 工程”项目、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唐仲英文化遗产实验室、考古学陕西省重点学科资助

前言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初，在中国先后诞生了西汉、东汉、三国（魏、蜀、吴）、西晋、五胡十六国、东晋、南北朝、隋、唐等王朝，这一时期也是“丝绸之路”在欧亚大陆开通、发展和繁荣的时期。10世纪以后的宋、西夏、辽、金、元、明、清时期，仍然与西方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但考古发掘已经充分证明，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在先秦时期已经开始了，绝不是自狭义的“丝绸之路”的开通才开始的，所以，“丝绸之路”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代名词而已，不能将其仅仅局限于西汉及其以后的各个时期，这已在学界达成共识。

从文献记载来看，狭义的“丝绸之路”开通于前2世纪，也即西汉武帝时期，而张骞出使西域则是其标志性事件。在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北壁上部初唐时期的壁画中，有一幅有关张骞出使西域的图像，其中有一长方形题记，其内容为：“前汉中宗既获金人莫知名号乃使博望侯张骞往西域大夏国问名号时。”^①（图1）这幅壁画将张骞出使西域的使命进行了改变，是佛教徒借用张骞出使西域这一历史事件，赋予了张骞出使西域以新的内涵，也可以看做是唐人对张骞出使西域的纪念性图像，从中也可以看到张骞出使西域对后世的影响。据司马迁在《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云：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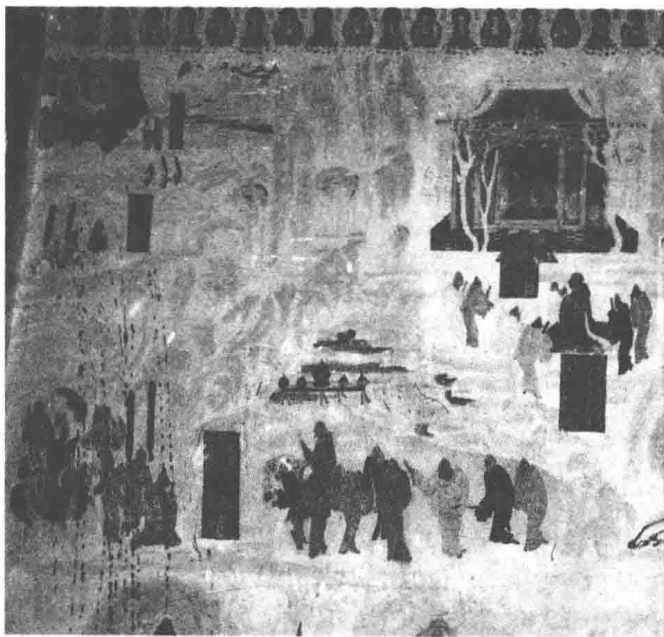


图1 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北壁上部壁画

^① 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莫高窟》（三），文物出版社·株式会社平凡社，1987年，图版68，第228页。

裴骃的《史记集解》引苏林曰：“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司马贞索隐云：“谓西域险阨，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①此前的东西文化交流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间接性、渗透式，而张骞的出使西域则标志着东西方文化交流变成了由国家组织的有目的的大规模全方位的文化交流，“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东西方的纽带，这一事件对中国古代乃至世界文明的进程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也正是因为如此，张骞的“凿空”才被当时人和后人视为丰功伟绩，“丝绸之路”的研究也才为世界所关注。它的研究对象，就学科而言包括历史学、考古学、美术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历史地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就器物的类别而言包括金银器、纺织品、陶瓷器、货币、漆器、玻璃（琉璃）器、玉器、香料、象牙、宝石。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在其《丝绸之路和日本》（《シルクロードと日本》）一文中，将东西方之间交流的主要物品分为八类^②：

1) 昆仑产的软玉，伊朗产的土耳其宝石，阿富汗产的青金石、石榴石等的美玉类。印度产的玳瑁、象牙，波斯湾和红海产的珊瑚、珍珠等。这些海陆产品往往作为装饰材料，或者景观设施。据《西京杂记》卷一“珊瑚高丈二”条云：“积草池中有珊瑚树，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条。是南越王赵佗所献，号为烽火树。至夜，光景常欲燃。”^③

2) 中国产的锦、刺绣、绫、罗、缙等丝织品。土耳其、阿富汗、西北印度、波斯产的羊毛布（罽）、绒毯等染织品。

3) 东地中海、伊朗的金银器、琉璃器，中国产的漆器、白瓷、三彩等。

4) 中国汉魏隋唐的铜镜，伊朗、东地中海产的金银细工产品、蜻蜓眼玻璃等装饰品。

5) 东西方豪华的刀剑、甲冑、马具等。

6) 东西方乐舞用的装束，包括面具、乐器等。

7) 绘画、雕刻、金工、图书、文具、游戏用的器物等工艺美术品。

8) 香料、药物等。

由此可见，其内容十分广泛，而且明显地带有奢侈品贸易的性质，这主要取决于它们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上述物品的性质也有相当一部分仍然属于“旧时王谢堂前燕”，尚未“飞入寻常百姓家”。正是东西方交流的物品的广泛性，使许多国家的学者不得不将视野扩大到整个欧亚大陆，才能解决自己国家出土物的来源，或者因出土物而所引出的新的历史问题，这也正是“丝绸之路”研究的魅力所在。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有关“丝绸之路”研究的各种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研

①（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9—3170页。关于张骞出使西域的类似记载，也见于《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张骞传》《汉书·西域传》等文献。

② 江上波夫：《シルクロードと日本》，奈良県立美術館《シルクロード大文明展——シルクロードオアシスと草原の道》，（株）大塚巧藝社，1988年，第12—24页。

③（汉）刘歆撰，（晋）葛洪集，王根林校点：《西京杂记》，《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3页。

研究成果等不断传入中国,使中国学者的眼界更为开放,思想更为活跃,从而使中国的“丝绸之路”研究得到空前发展。与此同时,同行间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信息的交流更是日新月异,以往难得一见的珍贵的可资对比的资料也渐为中国学者所掌握,为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甚至中国学者目前已经在亚洲、非洲等地展开了考古发掘,从被动地利用别人的资料走向主动获取第一手资料。另外,层出不穷的与“丝绸之路”相关的中国考古新发现,也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注意,为解开许多历史之谜提供了钥匙。之所以如此,一是古代中国曾是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是东方世界的中心,这一历史地位决定了其在“丝绸之路”研究中的重要性;二是中国古代的典籍汗牛充栋,而且在这些典籍中又对中国之外的各国历史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这些都是“丝绸之路”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三是由于在中国发现的与“丝绸之路”有关的众多遗迹与遗物,不仅出土地点明确,而且年代比较清楚,为判断其他国家和地区收藏的出土地点不明的藏品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对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丝绸之路”的研究离开了中国的考古新发现,不仅几乎变得不可思议,而且也不可能完整,所以,对中国境内的考古发现的有关外来文化的研究不仅魅力无穷,也是留给人类的永远的课题。其中引人注目的有:金碧辉煌的唐代金银器、粟特金银器、萨珊朝波斯金银器;晶莹透明的罗马玻璃器、萨珊朝波斯玻璃器、伊斯兰玻璃器;绚烂多彩的丝织品、唐三彩等,以其雍容华贵的造型、精美的纹饰,以及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成为许多学者较为关注的研究对象,甚至被视为绝世的美术品。同时,外来的造型、纹饰等又对中国古代金银器、陶瓷器、纺织品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金银器的魅力,不是因为金银本身珍贵,而是因为其精美的造型、优美的花纹,以及所包含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信息,对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也为探讨文化交流的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对于认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宗教信仰等都是非常有力的证据。

“丝绸之路”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对考古发现的各类与外来文化相关的遗迹和遗物,探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通过对遗迹与遗物的研究,进一步阐述中外文化交流的具体内涵及其影响;二是通过遗迹与遗物发现地点的探究,来恢复古代交通线;三是通过对古代人类遗迹与遗物的探究,探讨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与借鉴,共生共存、相互包容的问题。

关于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的具体路线,文献虽有记载,但有些地段仍不明确,需要进一步的深究和探索。海外遗物在各地点的发现,证明了不同历史时期交通线的变化,也大体上搞清楚了一些具体的古代交通线路。具体而言,从长安到河西有南北两路:南路经扶风、天水、兰州至武威;北路经彬县、平凉、固原至武威。出武威或安西,在新疆境内分南、北、中三路西行:南路经若羌、于田、和田至喀什;中路经哈密、吐鲁番、焉耆、库车至喀什;北路则自哈密、经吉木萨尔、伊宁西去。从河西到新疆是汉唐以来通西域的主要路线。

北方草原路是从新疆哈密经过内蒙古额济纳旗(汉代居延)东至河套,沿北魏六镇,经过山西大同(北魏之平城和辽金之西京)至朝阳(十六国之龙城,北魏、唐之营州)。

这是横贯欧亚大陆的一条很重要的交通线，特别是在北魏和辽时尤为繁荣，是沟通中亚、西亚乃至东北亚朝鲜等地的动脉。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不迟于陆路。广州、泉州、宁波（明州）和扬州是古代著名港口。广州是秦汉至近代经久不衰的外贸港口，汉魏六朝以来，自广州北上取官路经英德、曲江，翻越大庾岭，经赣州、九江至南京（建康）；或过骑田岭，经过郴州（桂阳）、长沙（临湘）至江陵或鄂城。

在这三条道路的沿线分别发现了由海外输入的镶嵌玻璃珠、蚀花肉红石髓珠、焊堆掐丝工艺的多面金珠，镶嵌宝石、青金石和金刚石的戒指和项链等首饰，以及金银器、玻璃器、伊斯兰釉陶器、波斯锦和罗马、萨珊波斯、阿拉伯的金银币等。中国发现的这些海外遗物多出土于有纪年的墓葬和塔基之中，对于研究国外收藏的无明确纪年的同类遗物是极好的比较材料。例如，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不仅是世界上年代明确的早期伊斯兰玻璃的标准器，而且这些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器物，放置在已经中国化了的佛教供养佛指舍利的塔基地宫中，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多元文明相互包容、和谐共存的生动体现，同时也见证了大唐文化的包容性、兼容性和多元性。西安何家村窖藏的发现，其意义也是如此，在该窖藏中出土了来自萨珊朝波斯的银币、东罗马的金币、日本的银质和同开珍、东罗马的玻璃器，还有大量的萨珊式、罗马式、粟特式金银器等，可以说是一个汇聚东西文明的聚宝盆。诸如此类的发现，也见于河北定州北宋静志寺塔基地宫。这充分说明中国古代文明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前的各个时代，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总体采取吸收、借鉴和包容的态度，所以，才能在世界上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西南方的中外交通路线，也有重要的考古发现，如在西藏吉隆县阿瓦呷英山口摩



图2 《大唐天竺使出铭》局部

崖上发现的唐显庆三年（658年）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该摩崖碑文阴刻楷书24行，残存220字左右，是唐使王玄策率刘嘉宾、贺守一等出使天竺，历尽艰险，经“小杨同”过吉隆时的勒石记事。碑文是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天竺时所刻。《大唐天竺使出铭》的发现，证明了王玄策两次出使天竺皆取道西藏，经过尼泊尔至印度，对于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而言极其重要（图2、图3）^①。

①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考古》1994年第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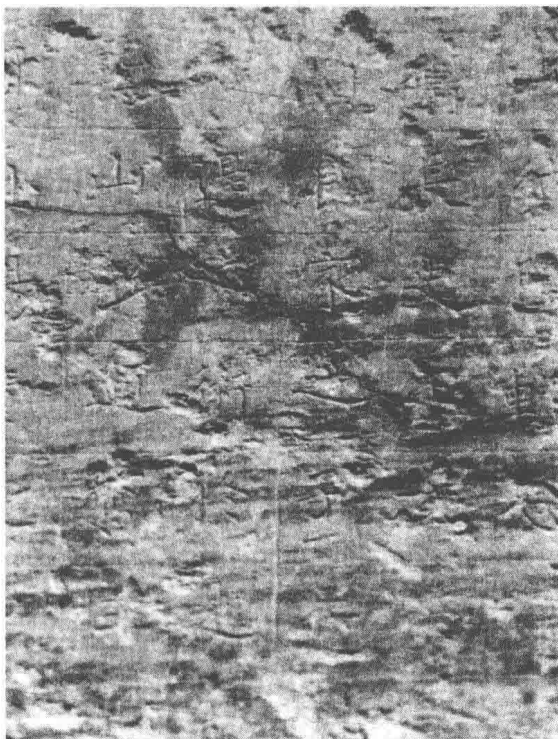


图3 《大唐天竺使出铭》局部

一、有关“丝绸之路”的概念

“丝绸之路”一词，是德国学者李希霍芬^①在其著作《中国》（全书共5卷，1877—1912年）的第1卷中首先提出的。当时，他选择了最能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的“丝绸”作为这条通商路的名字，其具体时间从前2世纪到2世纪，具体路线从中国到撒马尔罕，即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的州都。由于他提出这一概念之时，亚洲的考古学尚未兴起，“丝绸之路”所涉及时间的范围、通商路线被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有一定的局限性。尽管如此，李希霍芬所提出的“丝绸之路”概念，从此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并一直沿用至今。

1910年，德国地理学者赫尔曼在叙利亚帕尔米拉的古代墓葬中发现了中国丝绸，因此他在《连接中国和叙利亚的古代丝绸之路》一文中，在李希霍芬的基础之上，又提出将“丝绸之路”的终点延伸到叙利亚的帕尔米拉。

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于“丝绸之路”的认识，随着新发现的不断出现，有一个不断

^① 李希霍芬（Richthofen, Ferdinand von, 1833—1905年），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又译作里希特霍芬。生于卡尔斯鲁厄，卒于柏林。早年从事欧洲区域地质调查，旅行过东亚、南亚、北美等地。多次到中国考察地质和地理。曾任波恩大学、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教授，柏林大学校长。提出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的科学。首次系统地论述了地表的形成过程，并对地貌进行形成过程分类，研究了土壤形成因素及其类型。曾对亚洲地质、地貌特征进行过分析，并提出中国黄土风成的假说。著有《中国》《中国地图集》等（《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1269—1270页）。

丰富的过程。即使到现在，仍然需要不断深化。即使在中国，学者们的认识也未取得一致，有以长安为起点的说法，这种说法占据主流；也有学者认为应当以洛阳为起点。《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①一书就是这类观点的代表。严格地来说，这种争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自西汉开始，中国的文化中心也即都城在不断地变迁，在文化交流中都城是其集大成者，张骞凿空之时西汉的都城在长安，它自然是当时中国文化的代表，也即所谓的起点。西汉之后，洛阳、建康（南京）、平城（山西大同）等都曾经是当时的文化中心，都可以作为当时“丝绸之路”的起点，但对于西汉张骞开通的狭义的“丝绸之路”而言，它们也仅是挟长安之流风余韵而已。

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一点是，以前，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一些学者认为，“丝绸之路”是自中国的长安或洛阳开始，经过中亚、西亚，然后抵达欧洲（主要是指东罗马帝国，中国古代文献称之为“大秦”）。中国出版的《中国丝绸之路辞典》对“丝绸之路”的解释为：“3000多年前开辟的、2000多年前畅通的、1400多年前达到高度繁荣的‘丝绸之路’，是一条中国向世界开放之路，寻求友好之路，贸易和文化交流之路。这条道路东起长安，西到罗马，全程7000余公里，途经今日的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又从新疆的天山以北入中亚，从天山以南到达印度、阿富汗、伊朗、阿拉伯半岛直至地中海东岸。最后泛海（地中海）到意大利半岛或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到达东欧。自从有了这条交通大动脉，中国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得以西传；西方的哲学、宗教、科学、艺术源源东来；沿线的许多地区和民族得以吸收外来文明，振兴经济，发展文化，从落后的社会形态进入了先进的社会阶段。”^②

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丝绸之路”在东方的终点，通过中国继续向东北延伸至朝鲜半岛，最终达到日本。而这种延伸，显然是以长安或洛阳为中心的。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西域对于中国内地而言，是一个中转站，而对于朝鲜半岛和日本而言，长安或洛阳则是另外一个中转站。历史上，日本曾经与中国有密切的来往，见于文献的有《三国志》卷三十“魏书·倭人传”所记载的卑弥乎，而广为人知的则是“遣隋使”“遣唐使”“遣渤海使”的派遣，这些使者应当被看作是“丝绸之路”向日本延伸的搬运者。同时，唐代高僧鉴真也东渡日本，对日本的佛教、寺院建设、工艺等有很大的贡献。从实物来看，在日本福冈县志贺岛海滩发现的“汉倭奴国王金印”（图4），证明日本在东汉时期已经与中国大陆有密切联系，而这时“丝绸之路”已经开通，不仅可以认为日本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可以看作是“终点站”，如日本学者林良一先生在《丝绸之路和正仓院》（《シルクロードと正倉院》）这本著作中，专门列出名为“丝绸之路的终点站”一节，来说明“丝绸之路”的终点站是日本奈良的正仓院^③。具体而言，日本作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大约可以从1世纪的东汉算起，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到隋唐时期中日两国的交流达到了高峰。但总体来说，日本的

①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辑委员会：《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② 雪犁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③ 林良一：《シルクロードと正倉院》，株式会社平凡社，1966年，第52—1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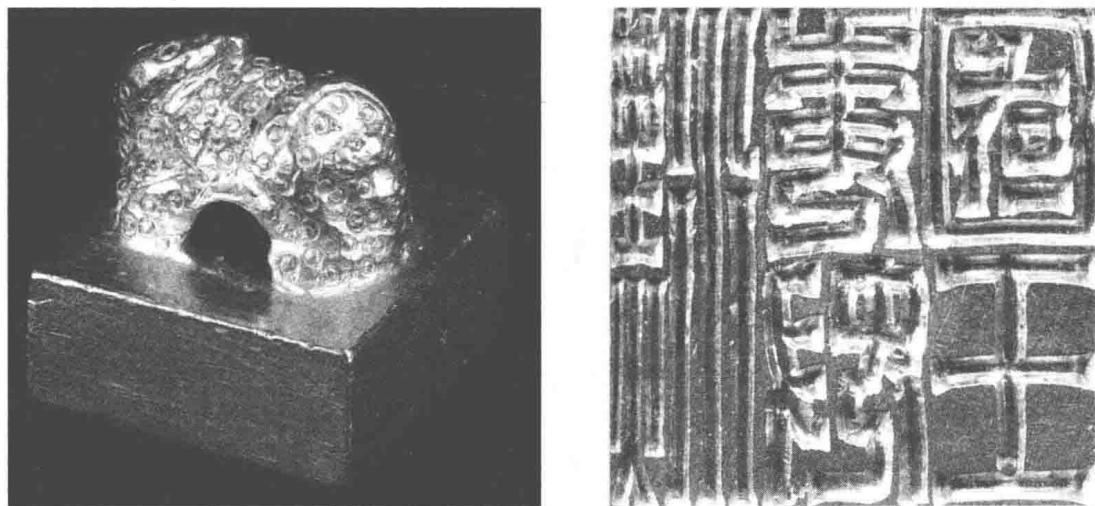


图4 日本福岡志賀島海灘出土的“汉倭奴国王金印”

“丝绸之路”主要是以中日之间的交流为主的，与中亚、西亚、印度以及欧洲的交流，主要借助于中国大陆而得以实现。既然“丝绸之路”的概念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其内容也不断地得到扩充。那么，“丝绸之路”的终点在日本奈良的观点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拙著所说的“丝绸之路”的路线主要是指：位于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丝绸之路；以长安、洛阳为中心，西达中亚、西亚、罗马，东达朝鲜半岛、日本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指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出发，经过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到达红海、地中海的路线。这三条“丝绸之路”可以说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它们将当时的几个重要文化圈——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以罗马为中心的欧洲、以萨珊波斯和粟特人为中心的西亚、中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则是陆上丝绸之路，这可以从中国内地到中亚、西亚沿途发现的当时的各类遗物得到证明。当然，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不可忽视的东西方交流的重要路线，如1998年9月—1999年6月，在印尼海域发现并打捞的9世纪的“黑石号”沉船中，发现约67 000件唐代瓷器，这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有力见证。

与此同时，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和内容出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概念，如“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海之路”等，这是针对文化交流的路线而言的。以交流的内容而言，则出现了“白银之路”“陶瓷之路”“茶之路”“玉之路”“绢马之路”“玻璃（琉璃）之路”等概念。这些概念的提出，无疑都是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不断深入和丰富的必然结果。其中“丝绸之路”一词，则选择了最能代表古代东方文化的中国丝绸作为象征，已经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学者承认和接受，也是至目前为止，最具有生命力和流传最广的提法。

对西域的经营，自汉代就已经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到了唐代，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而达到了顶峰。从唐太宗时期开始，唐王朝就开始注重对西域的经营，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灭高昌，在高昌故地设立安西都护府，后移至龟兹（今

新疆库车)，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升格为安西大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南至葱岭以西、阿姆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还统辖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设立北庭都护府，管辖原安西大都护府所辖天山北路、热海以西的西突厥故地，安西大都护府只管辖天山南路、葱岭以东的地区。安西都护府及北庭都护府的设立，使得唐王朝与中亚、西亚在空间上连接在一起，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也加强了与中亚、西亚的文化交流。

值得补充的是，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其接触外来文化的最早的渠道，是与北方草原地区少数民族的接触，而这些草原民族，在欧亚大陆纵横驰骋，一方面是战争的发动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他们源源不断地将西方、自身的物品和文化输入中原地区，同时也接受中原地区的影响，如战国时期的赵国采用“胡服骑射”，就是学习匈奴族。在蒙古高原匈奴活动的地区发现了来自中原地区汉王朝制造的车马器、漆器、铜器、丝织品等。在魏晋以前，北方地区的文化因素一直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联系，这就使人们在认识文化交流的问题上，不得不将视野转向北方草原地带。虽然当时的交流有时不是通过贸易等行为产生的，而是在战争、征服的背景下产生的，但其影响却是巨大的，这在考古发现的遗迹与遗物中得到了验证。

二、有关东西方的概念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西方”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不同的称呼，一般称为“西域”“西戎”等。在前3—10世纪，与中国对应的西方世界主要有安息、罗马（大秦）、萨珊波斯、贵霜、突厥、粟特（昭武九姓）、大食等。从现在的地理概念来看，是指中亚、西亚和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在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中亚、西亚及欧洲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发生了一系列的交往，如在中国甘肃、青海一带出土的彩陶，与西亚的彩陶非常相似，反映了这种交流开始的时代是非常早的，当然是缓慢的、渗透式的。正是这种文化交流，为世界文明的绚烂多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自汉王朝开通“丝绸之路”之后，这种交流变得更加剧烈和现实，远远超越了以往的渗透式或渐进式交流。到了隋唐时期，繁荣的“丝绸之路”更加引人注目。

地处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巴基斯坦也应当包括在广义的西方地区的范围之内，也是“丝绸之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离开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丝绸之路”的有些事情就无法理解。自汉代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以来，东晋的法显，唐代的玄奘、义净等高僧经过西域到达印度，他们在取回佛经的同时，自然也带回了印度文化。而且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也是研究古代印度不可或缺的资料，如果没有了这两部著作，印度古代历史的研究也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中国僧人和使节西去的同时，也有大量的印度僧人曾经经过西域进入中国，他们同样也是印度文化的传播者。

东方，则指广大的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蒙古。在朝鲜半岛和日

本发现的有关拜占庭、萨珊波斯遗物，主要是通过中国，经过朝鲜半岛，然后传至日本的。除了通过中国传入朝鲜半岛者，还有一部分是经由草原地带传入朝鲜半岛的。传入日本者，一部分则由日本使节带回本国，这些被“遣唐使”等带回的物品，最初由日本天皇等所拥有，并被天皇等施舍给当时较大的寺院，如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现宫内厅正仓院）、奈良法隆寺等，并一直流传至今。也有一部分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入朝鲜半岛，然后传入日本。日本学者认为奈良是“丝绸之路”的终点，其重要的证据就是正仓院的金银器、铜器、琉璃器、丝织品等，以及与“丝绸之路”有关的珍宝，其中不仅有大量的来自唐王朝的金银器、玻璃器、丝织品等，还有来自更遥远的西方产品，如其中的萨珊朝波斯的磨花玻璃碗、受地中海东岸或叙利亚的影响生产于西亚的蓝色凸圈纹玻璃杯（图5）、伊斯兰白色玻璃带把瓶（图6）、带有西亚风格的人物狮子丝织品（图7）等。与之类似者，在日本奈良法隆寺也有珍藏（现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法隆寺宝物馆），如其中具有西亚风格的四骑狮子狩猎纹锦（图8）。同时，在日本奈良新泽千冢126号古坟（年代为5世纪）中，出土了萨珊朝波斯磨花玻璃碗（图9），这些传世的珍宝和出土的外来输入品，都充分证明日本是“丝绸之路”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同样，朝鲜半岛也曾经是“丝绸之路”研究中重要的一环，如在韩国庆州的天马冢、黄金冢、皇南大冢（图10）、瑞凤冢（图11）及松林寺（图12）等墓葬及塔心础中都发现西方传来的玻璃器、金银器等，在这些遗物中，有些是来自西亚、中亚、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制品，这些都是朝鲜半岛作为“丝绸之路”一部分的重要证据。进入朝鲜半岛的传播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可能为“草原丝绸之路”；一条则是通过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同时，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发现的壁画中，不仅有中国唐人及唐代公主的形象，而且出现了头部插羽毛的高丽人形象，反映了朝鲜半岛与中亚也有密切的关系。这些事例都说明，以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和蒙古为主的东方地区，是西方文化传播的主要地区。



图5 日本正仓院藏玻璃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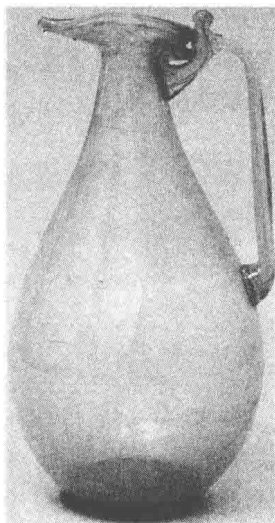


图6 日本正仓院藏伊斯兰玻璃瓶



图7 日本正仓院藏人物狮子丝织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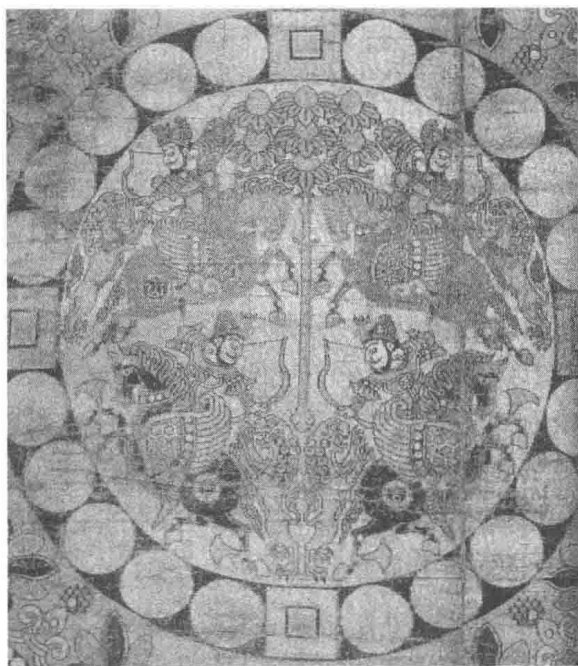


图8 日本法隆寺宝物馆藏四骑狮子狩猎纹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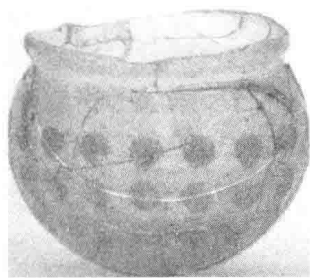


图9 日本奈良新泽千冢126号古坟出土的玻璃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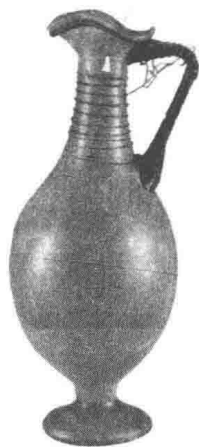


图10 韩国皇南大冢出土的玻璃胡瓶



图11 韩国瑞凤冢出土的玻璃杯



图12 韩国松林寺塔心础出土的舍利容器

本书所收录的九章内容，虽然相对独立，但都与东西文化交流相关，所以，笔者以“丝绸之路”为线索，犹如古代的钱贯一样，将九章内容串联在一起，从而构成了本书的架构。笔者所论述的有关问题，分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前辈学者已经在有关论著中有所涉及，但无暇展开论述者。笔者在其基础上结合新的考古发现进行了全面综合的研究，如第一章的“瓶花盛开”、第六章的“童子、花绳与龙马”等即是如此。二是国外学者，以日本学者为主，对其本国所涉及的问题已经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笔者在其论著中的观点启发之下，对我国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如“龟甲延寿”“毬路飞鸿”等章节即是如此。三是笔者在读书学习、教学和研究过程中的一点心得体会，属于不起眼的研究成果，或者说是还不甚成熟的感想。总而言之，不论是何种情况，学问之事都离不开前人的开拓，我们首先要担当的责任就是在对前人研究成果继承的同时，依据新的发现和材料去不断深思、总结、再拓展，这也是每代学人的责任所在。

还需要说明的是，拙著以“丝绸之路”为主线，并试图从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来考察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相关问题。笔者在本书所论述的内容，都是一些看起来细小甚至琐碎的问题，甚至有些问题虽然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但因司空见惯而被忽略或忘记了。笔者的所论所述实在无法与先贤大德的高屋建瓴相比，而且这些发现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所以，笔者将本书的书名称为“丝路豹斑”，并加了个副标题“不起眼的交流，不经意的发现”。尽管笔者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资质鲁钝，错漏之处恐难避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瓶花盛开——德瓶纹饰的源流	1
一、德瓶纹饰的发现及其地域性	2
(一) 北方地区发现的德瓶纹饰	2
(二) 南方地区发现的德瓶纹饰	15
二、德瓶纹饰的传播路线	24
三、德瓶纹饰的中国化	25
四、小结	39
第二章 象以齿焚——象牙与象的输入与使用	40
一、隋唐以前的象牙制品与象	40
(一) 先秦时期的象牙制品与象	40
(二) 汉代的象牙制品与象	46
(三) 魏晋时期的象牙制品与象的输入	58
二、隋唐时代的象牙制品与象的输入	61
(一) 货币代用品	64
(二) 象牙尺	65
(三) 象牙笏	70
(四) 象牙刀把与刀鞘	72
(五) 象牙饰如意	75
(六) 乐器(琵琶等)的拨	75
(七) 尺八和横笛	76
(八) 象牙双陆、双陆骰子及象牙饰双陆棋盘	77
(九) 梳子、簪与冠饰	80
(十) 小件家具装饰	83
(十一) 箱子的边饰	84
(十二) 文房用具	86
(十三) 化妆盒与针筒	87
(十四) 象牙带饰	88
三、小结	89

第三章 犀以角亡——犀牛与犀角的输入	90
一、隋唐以前的犀牛	90
（一）先秦时期的犀牛	90
（二）秦汉时期的犀牛	93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犀牛	96
二、隋唐时期的犀牛题材	97
（一）金银器上的犀牛纹	97
（二）铜镜上的犀牛纹	99
（三）石刻犀牛	102
（四）陶瓷器中所见的犀牛	103
（五）纺织品上所见的犀牛	104
（六）铁犀牛	105
三、隋唐时期犀牛角输入与用途	105
（一）器物装饰	105
（二）容器	107
（三）如意	108
（四）度量工具的尺子	109
（五）带饰	110
（六）梳子	111
（七）入药	111
（八）其他	112
四、唐代犀牛题材反映问题的探讨	112
（一）唐代有无犀牛生存？	112
（二）犀牛与中外文化交流	114
（三）驯犀与宫廷生活	116
（四）犀牛与祥瑞、镇水（辟邪）思想	117
（五）其他	118
五、小结	119
第四章 龟甲延寿——龟甲纹反映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120
一、中国以西的龟甲纹	120
二、中国境内龟甲纹的发现	123
（一）唐代以前的龟甲纹	123